

TWN 简报 2021 年 2 月

资源调动与《生物多样性公约》：超越差距

杰西卡·登普西 (Jessica Dempsey), 萨拉·尼尔森 (Sara Nelson), 延斯·克里斯蒂安森 (Jens Christiansen), 奥黛丽·欧文·布罗克 (Audrey Irvine-Broque), 费尔南达·罗哈斯·马奇尼 (Fernanda Rojas-Marchini), 帕特里克·比格 (Patrick Bigger), 阿德里亚娜·迪西尔维斯特 (Adriana DiSilvestro), 安德鲁·舒尔特 (Andrew Schuldt) 和伊丽莎白·夏皮罗·加尔萨 (Elizabeth Shapiro-Garza)

自 1992 年《生物多样性公约》(CBD) 提出以来, 资源调动的模式有三种:

- 1) 《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个目标都没有得到足够的资源¹。由于发达国家政府未能履行义务, 提供新的额外财政资源, 发展中国家并不能够有效地履行其承诺²。这通常被称为“资金缺口”: 即这三个目标所需资金与可用资源之间的差异。
- 2) 公共领域广泛的紧缩政策, 以及通过采掘主义、还本付息、逃税和贸易措施不断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移资源和财富³。这迫使各国、多边开发银行 (MDB) 和一些非政府组织 (NGOs) 创建和推动了一系列基本上不充分的、甚至有害的举措, 以吸引私人资本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
- 3) 在“监管”资金流和相关业务的无效自愿举措中, 公共和私人资金流量的指数增长助长了生物多样性退化型行业和部门。

“缺口”(模式一)主导了生物多样性政策的讨论, 混淆了模式二和模式三: 大量自由流动、无监管的公共和私人融资大量减少, 再加上持续的紧缩以及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持续资源转移。

还有一种替代方法: 以强有力的国家和多边行动为中心, 规范和改变导致生物多样性退化和群落退化的资金流动, 推动能够纠正过去和现在全球不平等现象的公共机构和政策。在呼吁从大流行引发的经济衰退中实现绿色复苏之际, 将环境与社会正义联系起来的协调一致的全球行动的重要性变得更为显著。正如经济学家贾亚蒂·戈什 (Jayati Ghosh) 最近指出的那样, “国际主义不是奢侈品。这是必须的。”⁴

目前正在谈判的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GBF) 拟议的资源调动部分已对这一替代方案有所认识。它概述了其实现“跨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性、包容性和公平变化”⁵使命的三个支柱:

1 三个主要目标为: 1) 保障生物多样性; 2) 可持续地利用其组成部分; 3) 公平合理分享由利用遗传资源而产生的惠益。

2 本简报使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术语, 因为它们是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中使用的术语, 有权利和义务方面的法律影响。

3 采掘主义有多种定义, 但通常指涉及自然资源的经济活动。包括矿物和化石燃料, 还包括大规模的单一农业、林业和渔业。在采掘主义下, 这些经济进程带来的收益不成比例地惠及全球北部的国家、跨国企业、金融企业和消费者。

4 Ghosh, J. (2020 年) 《如何构建全球绿色新政》——《进步国际》5 月 7 日

<https://progressive.international/blueprint/80b03a68-68ca-4322-a3ad-c91775f167b9-jayati-ghosh-how-to-build-the-global-green-new-deal/en>

5 参见“更新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零草案”

<https://www.cbd.int/doc/c/3064/749a/0f65ac7f9def86707f4eaeafa/post2020-prep-02-01-en.pdf>, p. 6.

a) 减少或调整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资源；b) 从所有来源筹集更多资源，以实现《公约》的三个目标；c) 提高资源使用的有效性和效率。⁶

这是一个可喜的转变。但是，推进变革和这三个目标的努力必须从过去和已有的研究中吸取教训。在一份题为《超越差距：将生物多样性融资纳入全球经济》的较长研究报告中，我们探讨了为实现上述每一个目标所做的现有努力和举措的记录。该档案中的关键见解总结如下。正如我们在建议部分详细介绍的那样，需要进行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和专门的公共投资，以确保朝着《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取得雄心勃勃的进展，包括为今世后代保护、可持续使用和公平地分享全球生物多样性使用的惠益。

鉴于对“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热情日益高涨，从前几轮气候和生物多样性融资中吸取教训尤为重要。基于自然解决方案这一路径的拥护者应特别留意一个教训：在不解决采掘主义的主要因素（即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严重的财富不平等，高债务负担和普遍的紧缩政策）的情况下，将投资积累到自然中，会导致地球的毁灭以及进一步侵犯人权。

为资源调动和 2020 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信息的主要经验教训

a) 减少或调整对生物多样性造成损害的资源

自由流动的资本和以企业为中心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加剧了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⁷：自 1992 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以来，私人 and 公共资本的流动加速了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环境问题，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以及全球精英阶层权力的集中。不受管制的资金流动和自由自在的采掘企业的经营为商品生产开辟了新的脆弱空间，扩大了那些承受采掘对环境造成的后果的人与那些从开发融资中受益的人之间的差距。2019 年，世界上最大的 50 家银行为生物多样性损失驱动行业提供了超过 2.6 万亿美元的担保，金额相当于加拿大的国内生产总值（GDP）⁸。正如最近的一项研究得出的结论，“金融部门正在为大规模灭绝危机提供资金，同时又损害了人权和土著主权”⁹。管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规则（或缺乏规则）牵涉到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是实现《生物多样性公约》决策和目标的一个关键障碍。此外，多边开发银行的贷款和援助往往附带贸易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的规定，以及与推动采掘式增长有关的政策转变，从而危及生物多样性。

自愿性计划在减少或调整损害生物多样性的资源方面能力有限¹⁰：1992 年里约会议上，全球精英和发达国家放弃了一种管理日益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投资的监管方法¹¹。由于各国不愿或无法监管跨国工业和贸易，承诺影响企业和金融行为的自愿机制占据了核心地位。这些机制包括全球契约、赤道原则、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等。这些自愿办法在减缓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方面收效甚微，也没有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驱动因素。企业和金融行为体自愿监管的记录提供了一个重要教训：尽管在评估气候或生物多样性风险的全球倡议或努力中，有越来越多的成员参与其中，但银行、企业、养老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并不愿意对自己的活动或投资进行自我监管。

⁶ 这些目标载于 CBD/SBI/3/5 附件二“现有资源调动战略可能的后续行动要素草案”。

<https://www.cbd.int/doc/c/2c34/9558/f1487764d65e89bafb74d8fa/sbi-03-05-en.pdf>，第 15-16 页。这三个目标与脚注 5 中 GBF 文件中概述的五个目标略有不同。

⁷ 见《超越差距》第 2.2 节和第 2.3 节。

⁸ Portfolio Earth (2020).《资助灭绝》，p. 6。摘自 <https://portfolio.earth/>

⁹ 同上。

¹⁰ 有关更多信息和研究，请参阅《超越差距》第 3.4 节。

¹¹ Rowe, J. K. (2005)。《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商业策略》。见 R. D. Lipschutz 和 J. K. Rowe 合著的《全球化、政府主义和全球政治：对我们其他人的监管？》（Routledge）。

逐步取消有害补贴的进展令人沮丧¹²：《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认识到，正如爱知目标 3 所述，有必要“取消、淘汰或改进对生物多样性不利的各种补贴机制”，将其作为阻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策略。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采取行动的制度承诺仍未兑现，而改革有害的补贴机制是爱知 20 个目标中表现最差的一个。即使是对损害生物多样性补贴的保守估计也表明，用于有害激励和补贴的公共支出依旧超过国内和国际上对生物多样性举措的支出：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20 年的一份报告估计，用于可能对生物多样性不利的各种补贴的资金每年接近 5000 亿美元，是用于保护的资源的五到六倍¹³。阻碍在有害补贴方面取得进展的因素主要包括缺乏透明度、对补贴资金流动及其对社会和生态的影响的研究不足，以及根深蒂固的政治权力和受益于补贴的精英利益。此外，虽然补贴的利益往往是在阶级、种族和性别方面出现不平等现象，但在没有替代办法的情况下取消这些方案仍然可能对边缘化社区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正如最近在厄瓜多尔和埃及所证明的那样，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可以纳入多边开发银行（MDB）授权的经济改革，这相当于深化紧缩，不成比例地影响到更依赖国家服务的社区¹⁴。因此，解决地方和全球在政治权力和获得资源方面的不平等，必须是逐步取消有害补贴的组成部分。补贴维持着不公平的资源使用和决策模式，取消补贴需要采取反补贴政策，以更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重新分配资源。

b) 从所有来源筹集额外资源，以实现《公约》的三个目标

发达国家未能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20 条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所载的义务（CBDR）¹⁵：在宏观上看，发展中国家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发展筹集的资金“远远低于富裕国家在里约承诺的数额”¹⁶。虽然自 1991 年全球环境基金（GEF）成立以来，援助资金有所增加，但登记的金额与根据《21 世纪议程》达成的主要协议相距甚远，各国每年为全球环境问题承诺约 180 亿美元，其中 20 亿美元直接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此外，“自 1992 年作出这一承诺以来的任何一年中”，没有一个捐助国履行了其承诺，“最终援助总资金占里约承诺的 58%”¹⁷。全球环境基金内供资不足和政治影响力不平等阻碍了关于财政资源的第 20 条的实现，进而阻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的实现。特别是，必须认识到，对原住民和地方社区（IPLCs）的财政支持“与其对可持续利用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贡献不相称”¹⁸。鉴于这些失败的承诺，政治行动强调“所有来源”资金的作用，包括国内资源、南南合作和私人资金。强调国内资源和南南合作已把负担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而发展中国家本身经常受到债务和紧缩政策的阻碍。同样，强调私人“混合”融资有助于发达国家进一步规避第 20 条所要求的直接资金提供，特别是，有证据表明混合融资对捐助方的私人部门公司，包括金融部门给予了优惠待遇¹⁹。

12 见《超越差距》第 2.3 节。

1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20 年）。《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综合概览（最终报告）》，第 3 页。摘自：
<http://www.oecd.org/environment/resources/biodifications/report-a-comprehensive-overview-of-global-biodifications-finance.pdf>

14 Reyes, O. (2020 年)。《改变财政，而不是气候》，政策研究所和跨国研究所。

15 见《超越差距》第 1.1、1.2 和 1.3 节。

16 Miller, D. C., Agrawal, A. 和 Roberts, J. T. (2013 年)。《生物多样性、治理和国际保护援助的分配：生物多样性援助分配》。Conservation Letters, 6(1), 12-20. <https://doi.org/10.1111/j.1755-263X.2012.00270.x>, 第 17 页。

17 同上，第 16 页。

18 《森林人民计划（2020）》。《地方生物多样性展望 2：土著人民和地方社区对执行〈2011-2020 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和更新自然和文化的贡献》，第 29 页。

19 Pereira, J. (2017 年)。《混合金融：是什么、如何运作以及如何使用》。欧洲发展署和乐施会的报告 摘自
https://www.eurodad.org/blended_finance_what_it_is_how_it_works_and_how_it_is_used

普遍的紧缩政策、高额的债务还本付息，薄弱的税收制度/避税措施阻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实施²⁰：紧缩的逻辑和政策霸权往往是通过多边开发银行对债务负担国的贷款条件强加的，形成了主权债务增加的顺周期模式，导致外币利息支付耗尽了外汇储备。同样的债务紧缩关系导致负债国家为了获得贷款而将国内利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进一步耗尽公共收入。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能够帮助实现 CBD 目标的国内资源非常有限；研究表明，即使在纠正经济增长和农业扩张等压力的情况下，国家加大对环境法规和执法的投入也可以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损失²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关于环境法治的第一份报告还发现，世界范围内许多环境法没有得到执行，执行部门通常资源不足，资金不足²²。高水平的债务还本付息和结构调整政策也阻碍了《生物多样性公约》国家层面的实施措施，因为它们迫使扩大出口导向型商品发展，从而威胁到生物多样性和生计。富裕的精英阶层和企业避税和逃税加剧了财政紧缩，进一步侵蚀了国库，使《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实施具有挑战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不可能的。

受地域限制，加强生物多样性项目的营利性资金流动很小，并且永久处于“试验项目”的状态²³：在过去二十年里，一直强调动员私人金融资源来填补“差距”，通过以市场为基础的保护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市场化或“混合融资”的方法，使用公共、慈善或超国家资金来“最大限度地利用”、“解锁”或“催化”私人投资。这些做法本身不是解决办法，而是目前限制公共资金的紧缩措施的症状。而且有证据表明这些做法存在负面的社会影响，包括侵犯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的权利。尽管人们对可用于填补《生物多样性公约》融资缺口的私人资本的数量持乐观态度，但依据过去三十年的努力（从生物勘探到森林碳排放），人们质疑这些方法是否有可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必要的资源以及是否能符合人权和社会公正。

基于市场的方法，例如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并不代表着保护资金的主要新来源，对生物多样性和生计的影响也很复杂²⁴：这项研究为倡导“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政府和机构上了重要的一课，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PES 对生物多样性没有积极的影响，甚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在解决与生物多样性丧失有关的土地利用变化问题方面最成功的方案中，它们与当地的做法、经济和机构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当地的价值观和知识，并公平地分享惠益。PES 的历史记录为环境敏感政策的设计提供了经验教训，但也表明此类项目难以标准化和规模化——这是另一个教训，可以缓和对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当前的热情。正如一项专门关注 PES 在《生物多样性公约》下资源供应潜力的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与现有的公共就业计划相反，[生物多样性公约]的新的筹资机制应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生物多样性长期保护提供资金……不考虑生态系统提供的任何其他生态系统服务”²⁵。因此，尽管 PES 是一个有用的工具，但它不足以满足生物多样性的资金需求，而且几乎不能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大规模驱动因素。正如《地方生物多样性展望 2》报告所述，至关重要的是，所有生物多样性融资工作“都应加强保障措施，以解决生物多样性融资对原住民与地方社区（IPLCs）的持续负面影响，并积极保障其权利”²⁶。

20 见《超越差距》，第 2.1 节。

21 见 Waldron, A., Miller, D.C., Redding, D., Moores, A., Kuhn, T.S., Nibbelink, N., ... Gittleman, J. L. (2017 年)。《通过保护支出预测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减少》《自然》，551 (7680)，364-367。

22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19)。《环境法治：第一份全球报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内罗毕。摘自：<https://www.unep.org/resources/assessment/environmental-rule-law-first-global-report>

23 有关更多信息和研究，请参阅《超越差距》第 3.1 节和第 3.2 节。

24 见《超越差距》，第 3.1 节。

25 Hein, L., Miller, D.C. 和 de Groot, R. (2013 年)。《生态系统服务付费和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融资》。《环境可持续性的当前观点》，5 (1)，87-93，第 91 页。

26 《森林人民计划 (2020)》，引自第 29 页。

c) 提高资源利用的有效性和效率

面向市场和私营部门的举措（包括混合融资或公私伙伴关系（PPPs））的投资回报率，在很大范围内都很低或者为负²⁷：那些提倡混合金融的人认为，公共投资将促进私人资本流动的增加，使有限的公共资金发挥最大作用。然而，这些证据对这些说法提出了严重的质疑，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濒于崩溃的 REDD+市场，它仍然完全依赖公共补贴来实现其非常有限的生态和经济影响²⁸。与此同时，研究人员强调，混合融资和 PPPs 的使用可能会降低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和民主控制，不能使最低收入国家受益，还会增加国家债务负担²⁹。甚至世界银行的增长与发展委员会也指出，PPPs 往往“将利润置于私人手中，而风险则由公众承担”³⁰。这样的警告值得仔细考虑。尽管通过 PPPs 或混合融资“催化”、“最大限度地利用”或“吸引”私人投资以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已成为越来越普遍的呼声，但执行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经济规则的机构往往唱得最响亮。吸引私人资本的需要反映出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趋势，例如紧缩政策、未能履行第 20 条规定的义务以及不充分的金融和公司监管。

在生物多样性融资中强调经济效率会使生物多样性和人们都面临新的市场风险³¹：在以市场为基础的机制下，对效率的关注往往与更严格的、类似市场的方法同时出现，这可能会导致负面的社会影响。虽然一些人认为市场驱动的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公共服务项目比公共资助的 PES 项目更有效及高效，因为它们更有针对性和条件性（以土地利用变化或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为条件的付款），但这种强调会使生物多样性成果和参与者的生计面临新的市场风险。风险承担对于开发新的在线游戏或软件应用程序的企业家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维护地球的自然和生计时是不适当的。PES 研究的这些发现应该成为“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讨论的中心。

对市场解决方案效率更高的持续信念源于经济教条，几十年来尝试将这些解决方案付诸实践的证据并不能支持这一观点³²：虽然以市场为导向的计划，包括 PES 或现在由“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实施的计划，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发挥支持公平和生物多样性成果的作用，但试图实现“高效”市场之类的功能的尝试往往会缩小优先考虑的收益范围，并且需要大量的国家资源。根据这些证据，更有效和高效的全球行动途径，将是集中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根本原因以及对有害补贴进行重新调整和有管理地逐步淘汰的金融监管，换句话说，就是对资源调动任务的第一支柱采取坚定的行动。

建议

- 1) 结束助长采掘主义、阻碍《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的债务紧缩关系。为了推动进行变革的呼吁，《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必须：

²⁷ 见《超越差距》，第 3.3 节。

²⁸ Olesen, A., Böttcher, H., Siemons, A., Herrmann, L., Martius, C., Román-Cuesta, R. M., ... Wunder, S. (2018)。《欧盟对 REDD +相关活动的融资研究，以及对 2020 年前后基于结果的付款研究：来源、成本效应和公平分配激励措施》。摘自欧盟出版物办公室网站：<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6f8deale-b6fe-11e8-99ee-01aa75ed71a1>

²⁹ Romero, M. J. 和 Ravencroft, J. (编辑) (2018 年)。《历史重演：公私伙伴关系是如何失败的》。由欧洲开发署协调，世界各地的民间社会组织与 Heinrich-Böll Stiftung 合作制作。

³⁰ 世界银行增长与发展委员会 (2008 年)。《增长报告：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战略》，第 36 页。

³¹ 见《超越差距》，第 3.1 节和第 3.2 节。

³² 见《超越差距》，第 2.3、3.1 和 3.4 节。

- 拒绝紧缩/债务主导的国际和国家政策，这些政策继续阻碍《生物多样性公约》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展以及大流行病的复苏，相反，要推动支持全球健康、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所必需的有力的南北转移³³。
 - 重申并履行第 20 条规定的义务，不是作为援助或慈善，而是作为发达国家对巨额生态债务的偿还。
 - 增加对原住民与地方社区倡议的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资金³⁴。
 - 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目标和决定，推动主权债务重组，包括一定程度的债务取消或重组，使各国政府能够优先投资于高质量的公共服务以及公正和可持续的大流行病复苏³⁵。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应要求附属执行机构（SBI）就债务、紧缩和《生物多样性公约》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消除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具体障碍。
- 2) **监管金融，惩罚那些破坏生物多样性和原住民与地方社区权利的行业。**当前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中的话语薄弱，存在强调自愿披露和众所周知无效行动的风险。缔约方应：
- 取消损害生物多样性和社区的补贴，将这些财政资源以及浪费的军费重新用于支持原住民、农民和小农户的管理上。
 - 积极支持制定一项关于商业和人权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其中纳入了针对公司侵权和滥用人权的明确责任标准，并确保受害者能够获得补救和司法救助，包括恢复和赔偿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
 - 修改监管机构融资的信托责任和概念，以要求保护公共产品，如安全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并包括对《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UNDRIP）和《联合国农民和其他农村劳动者权利宣言》（UNDROP）等国际法律规范和标准的承诺³⁶。
 - 要求公共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中央银行政策通过监管（非自愿措施）与 CBD 目标和决策保持一致。
 - 确保贸易和投资协议中不存在否定或破坏《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以及更广泛的人类、原住民和农民权利的条款。
 - 实施“污染者付费原则”，包括对国际航运、采掘业和工业农业等破坏性活动征税。
 - 确立尽职调查的法律义务，包括在投资链的各个层面考虑、识别和披露生物多样性风险的义务，包括机构投资者和资产管理公司的风险。这项尽职的义务应与在不履行时给予相应的制裁相联系。
 - 制定与企业披露有关的规则，包括环境、社会和治理（ESG）风险，以提高关键可持续性风险（包括生物多样性）非财务披露的质量、标准化和可比性³⁷。
- 3) **确保生物多样性融资不会阻碍变革，也不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和《联合国农民和其他农村劳动者权利宣言》。**在社会、经济和环境标准方面，包括抵消机制在内的自愿和基于市场的机制的记录令人失望，但它们仍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讨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缔约方应：
- 摒弃阻碍或破坏必要的变革的金融和市场机制，例如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为基础的碳补偿，这些碳补偿通常使采掘主义和权力关系合法化。

³³ 见 Kozul Wright, R. (2020)。《要从 COVID-19 中恢复得更好需要重新思考多边主义》。Development。
<https://doi.org/10.1057/s41301-020-00264-y>

³⁴ 参见《森林人民计划》（2020 年），同前。

³⁵ 同上。请注意，本建议不支持债务换自然掉期，我们在本简报的较长档案（第 2.1 节）中对此进行了审查。

³⁶ 参见：<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hrc/wgtranscorp/pages/igwgontnc.aspx>

³⁷ 见“可持续性企业治理”声明，网址：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3502101

- 确保使用像生态系统服务付费（PES）这样的市场激励机制，以支持努力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间接和大规模驱动因素，包括不公平的发展和资源使用，并尊重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的权利。
 - 确保生物多样性融资促进《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三个目标，而不损害为推进和保障原住民、农民、妇女和地方社区权利而作出的决定。
 - 加强对所有生物多样性资金流动（包括私人和公共）的保障措施，以确保所有权利持有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自由、事先知情同意³⁸。
 - 拒绝继续将损失社会化和收益私有化的混合金融和公私伙伴关系，而是实施上文（第2点）概述的强有力的监管办法，更有效地将资金从损害生物多样性的活动转移出去。
- 4) **减少阻碍转型变革的国内外财富和权力不平等。** 财富不平等集中了权力，而这种权力使必要的政策变革变得困难。缔约方应：
- 为环境和土地维护者制定有效的保障措施³⁹。
 - 支持制定《联合国税收公约》，通过普遍和政府间进程解决避税天堂、跨国公司滥用税收和其他非法资金流动问题⁴⁰。
 - 实施累进税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国际和国家财富税，提高全球银行和大型企业的税率，增加实施《生物多样性公约》的资金，支持从大流行中公正地复苏，并纠正不平等的社会和环境影响。
 - 支持反垄断措施，打破对政策制定具有不成比例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和企业的权力。
- 5) **采取行动消除阶级、种姓、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法案，这些不平等加剧了生物多样性的丧失，阻碍了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缔约方应：
- 认识到种族、性别、种姓和财富不平等既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驱动因素，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目标实现的障碍⁴¹。
 - 设立一个专家组，向附属执行机构（SBI）第四届会议报告，进一步研究种族、性别、种姓和财富不平等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目标/决定之间的关系。
 - 将资源调动（包括全球环境基金的资源）的重点放在支持原住民和小农渔民/农民的持续管理和法律/政治秩序上。他们正在制定用于保护和可持续使用的法律，但长期以来他们因生物多样性的丧失而受到指责。

我们的团队由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Jessica Dempsey*、*Adriana DiSilvestro*、*Audrey Irvine Broque*、*Fernanda Rojas Marchini*、*Sara Nelson*、*Andrew Schuldt*）、英国兰开斯特大学（*Patrick Biger*、*Jens Christiansen*）和美国杜克大学（*Elizabeth Shapiro Garza*）的社会科学家组成。本简报以“超越差距：将生物多样性融资纳入全球经济”的研究档案为基础，其重点来自我们特定的专业领域：政治生态学、自然政治经济学、多尺度环境治理和环境变化，以及环境损害的不均分布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³⁸ 另见《森林人民计划》（2020），同前，第29页。

³⁹ 同上，第13页。

⁴⁰ 参见联合国政府间税收委员会，例如，<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finance/what-we-do/ECOSOC/tax-committee/tax-committee-home>

⁴¹ 参见，例如，Tendayi Achiume, E. (2019)。《自然资源采掘主义和种族平等》。联合国高级专员办事处，关于当代形式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问题特别报告员的专题报告。

<https://www.ohchr.org/CN/Issues/Racism/SRRacism/Pages/ThematicReportNaturalResourceExtraction.aspx>

本简报由瑞典生物/斯德哥尔摩复原中心和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理事会提供部分资金。